

同時也夾雜其個人的關懷與利益」(頁 480)。本書亦不啻清代思想、學術與心態的又一次書寫和重刊，讓人感覺到歷史的「過去性」和「現在性」構成了一個「同時存在的整體」(艾略特語，見〈序論〉，頁 xv)。我無意去猜測其間作者的個人關懷，但我確信，本書的影響必遠遠超越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史，它會改變我們對清代的認識，成為研究這一時段必讀的經典之作。

Shanghai's Dancing World, Cabaret and Urban Politics, 1919-1954. By Andrew David Fiel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64.

陳碩文，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上海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自清末以來，為中國中西思潮交會，新舊文化交融首當其衝之地。一九三〇年代，上海都會更蓬勃發展，有「東方巴黎」、「魔都」之稱，儘管在嶄新氣派的商店街後，破敗不堪的棚戶觸目可見；繁榮多元的文化出版市場更與燈紅酒綠的酒家舞場並立。一九四九年後，上海摩登暫偃旗息鼓，直至改革開放後，又漸展風華。上海都會文化在中西新舊文化折衝間經數十年演變，樣貌絕非單一，難以一言蔽之；其現代化之路與國族命運相連，複雜特殊，更成為探討近現代中國如何在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下進行國族建構、文化轉化之絕佳案例，是故近年來備受學界關注。從都市治理、物質文化、翻譯交流、媒體出版等各種角度探討近現代上海的研究成果，可說從不同面向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文化的複雜面貌。

上海研究成為相關領域的熱點固然為時已久，然仍不乏精彩研究為之注入活水。費嘉炯(Andrew David Field)此書，探討上海舞廳，研究年代從民國初年跨越到中共建國後，從都會治理與舞廳文化之關係展開論述，乃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¹³，為其積累多年的研究成果。上個世紀上海舞廳文化，誠如作者所言，是中西文化在上海交融的產物，並典型地展現其時上海人在租界文化的帶動下，接觸西方文化、現代生活的樣貌。跳舞，既是高雅的社交活動，而營業性質的舞廳，又具大眾化、通俗化的特質，反映上海都會文化雅俗

¹³ Andrew David Field, "A Night in Shanghai: Nightlife and Modernity in a Semi-Colonial Chinese City, 1919-1937"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1).

並陳的一面；當時的舞廳以新潮絢麗的裝潢相競逐，然身處其中的舞女卻不乏強顏歡笑者，更充分顯現出貧與富之間的差異。上海舞廳因此不僅是上海摩登一景而已，更具體而微地呈現上海，乃至於中國衝撞顛簸的近現代旅程中諸多風景。此書以上海舞廳作為研究對象，其重要性由上可見。

以往學者論及近現代上海，或側重其摩登多元，或著重談其墮落罪惡，較難全面地呈現上海都會文化的複雜向度。然費嘉炯談舞廳，分析都會政治與舞廳文化之聯繫，以翔實資料釐清都會文化、市政管理、政治脈絡與舞廳之間的關係及互動；此外，還從建築外觀、營業狀況、舞業人員及舞客等面向，具體建構出上海舞廳的歷史，頗能兼顧兩者，使人一窺上海都會全貌。本書依上述兩個方向，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有五章，以舞廳的文化史與社會史論述為主，從「跳舞」此西風如何東漸上海談起，依序分析舞廳裝潢、舞女、舞客，闡述跳舞文化在上海逐漸商品化的歷程(1919-1937)；第二部分有四章，分別探討抗戰時期、孤島時期(1937-1941)、日本與國民政府統治時期(1942-1947)、舞潮案年代(1948)，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1949-1954)舞廳銷聲匿跡為止，舞廳與都會政治之關係。此書後記中略提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及至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跳舞文化，至此略勾勒出中國舞廳百年面貌。此書研究範圍包括報刊、史料、文本、檔案、廣告、回憶錄、訪談，資料扎實，觀點全面，文字流暢，書中所收照片、圖表亦頗可觀。書後所收附錄，其一是上海大滬舞廳(The Majestic Café Company)的個案研究，分析其營業、所有權概況，並列出營業收支圖表等；其餘分別是上海公共租界合法營業舞廳的舞女人數統計表(1941-1942)、舞廳從業人員人數統計(1947-1948)等，亦頗為翔實。下文將分為兩部分，先簡介本書內容大要以及貢獻，後對本書觀點提出評述。

此書首章為導論，交代此書旨趣，呈現此書架構：先分析爵士樂、社交舞如何在一九二〇年代從西俗變為一般市民休閒娛樂，接著考察三〇年代上海舞廳之發展如何糾葛於戰前戰後複雜的政治文化中，最後，以探討中國當局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管制舞業的原因和方法為總結。首章亦談及此書主要參考的兩種材料：(1)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上海西人的回憶錄或見聞，(2)中國人的記錄和觀點，亦包括文學作品。作者並進一步以穆時英為例，說明當時許多中國作家、藝術家、電影工作者和記者，其筆下的舞廳「概括了現代都市生活的瘋狂步伐」(p. 8)，象徵了享樂、墮落的生活與消費模式。作者認為，穆時英筆下的上海舞廳，有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其「拱廊街

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 中揭露的十九世紀巴黎拱廊街一般，是展示「現代性的夢幻世界」(Dreamworlds of Modernity) (p. 4)。然而，它亦深深嵌入一個複雜的政治網路中，為各種政府、幫派、警察制度所規訓、管理；而三〇年代在舞廳享樂的上海市民，很難不察覺到這個複雜的脈絡。確實，上海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市政管理、人口結構十分多元，此亦是其都市研究之價值所在，而舞廳，即是此複雜面貌的一個縮影。

本書第一章“From Grand Balls to Jazz Cabarets: Westerners and Jazz-Age Culture in Shanghai, 1919-1926”（從舞會到爵士舞廳：西方人和爵士年代文化在上海，1919-1926），探討上海跳舞文化的起源與變遷。文章從十九世紀末在滬西人時常舉行凝聚共同感與民族意識的社交舞會談起，接著闡述在一戰結束後，發跡自美國，在歐美各地流行的爵士文化如何進入中國，形成熱潮。而在營業舞廳如卡而登 (Carlton Café)、大華 (Ambassador Ballroom) 紛紛出現後，亦有爵士名家受邀來華演出，爵士樂曲遂逐漸流行滬上。此一來自美國爵士年代的跳舞文化不同於大型社交舞會，具自由、奔放、開放的特質，因此有助於打破社會、文化屏障。作者總結道：此一爵士年代文化的流行，「引領了上海國際都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p. 51)。

第二章“Turning Lazy Opium Smokers into Spry Jazz Maniacs: The Rise of Chinese Dance Madness and the First Chinese Cabarets, 1927-1931”（懶惰老鴉片鬼變成活潑爵士迷：中國跳舞狂潮與中國第一個舞廳，1927-1931）闡述一九二八年前後在上海灘興起的營業性舞廳與跳舞熱，為市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休閒生活空間。造訪舞廳的人，自與電影、文學、藝術相關的人士，漸漸普及於一般民眾。通俗作家周瘦鵑，在其有如舞廳指南的作品中，展現了當時舞廳的生態情狀。作者更指出，舞女的出現，「在中國舞業的發展上扮演了關鍵性角色。」(p. 65) 對當時人來說，能與象徵「摩登女性」的舞女在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空間共舞，使人得以抽離日常生活，彷彿進入夢幻世界；而此幻影中亦可說投射了中國人對新時代的想像。

一九三〇年代上海各大舞廳的位置、外觀與裝潢，是第三章“Towers and Palaces: Ballroom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1929-1936”（高樓與宮殿：舞廳建築與室內設計，1929-1936）的主要內容。儘管國共兩黨爭鬥不斷、中日關係緊張，一九三〇年代的上海娛樂業仍蓬勃發展，電影院、遊樂場和舞廳繼續湧現。上海舞廳多位於租界內，建築設計光鮮亮麗，極富異國色彩，具夢幻氛

圍。當時較出名的豪華舞廳如百樂門、仙樂斯、逸園大舞廳，皆備有大舞池及世界級的爵士樂隊——如 Buck Clayton 和其「哈林紳士」(Harlem Gentlemen) 樂隊；較次級的如維也納、揚子飯店舞廳亦備有舞池，為上海市民建構起一個美妙的新世界。

一九三〇年代以來，上海的營業性舞廳日漸增多，跳舞文化亦漸普及，中國舞女人數也相對增加，舞女及舞廳幕後消息，成為各式報刊關注的對象。通過報刊媒體的建構，上海舞女成為「美麗但又危險」的現代女性象徵；在她身上，凝聚了時人的現代想像。此書的第四章“Important Attractions: Cabaret Hostesse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abaret Culture in Chinese Society, 1932-1937”（重要的吸引力：舞女和中國社會舞廳文化的大眾化，1932-1937），便著重分析特別關有舞場專欄、銷量不錯的《晶報》，以探討上海舞女在報刊上呈現的形象，並論及其生活與收支狀況，與舞客間的關係，舞后選拔會等。作者並將舞女與現代性的兩面——危險與愉悅——並置；亦即，上海一九三〇年代舞女的生活和形象，實則反映了現代都會生活的一體之兩面——都會既使人們較以往更容易聚集，但都會生活的冷漠，亦易使人們感到漂浮失根，有如舞女時常看似摩登，實則淒涼的命運。

一九三〇年代，舞廳亦可視為轉變中的中國之象徵，一個中西交會的混雜 (hybrid) 空間，時髦的上海年輕男女在其中展示其西化、都會的生活方式，然批評的聲浪亦不曾間斷。在第五章“Improper Amusement: Chinese Patrons, Chinese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Cabaret Culture, 1932-1937”（不合宜的娛樂：中國舞客、國府政治與舞廳文化，1932-1937）中，作者爬梳報刊，以探討舞客組成，當時報刊對舞廳文化的反思，還考察當時舞廳的表演節目、跳舞比賽及性議題。本章指出，隨著跳舞成為受歡迎的消閒娛樂，與之相關的活動、產業也紛紛開始出現，如跳舞學校、跳舞大賽等。然在一九三四年國民政府推動新生活運動後，一連串關於舞廳文化如何影響中國社會的廣泛討論，對舞業形成壓力。舞業所發起以募款為名的跳舞競賽，倡導在舞廳使用國貨，演奏中文歌曲等，便反映了其彌合愛國思潮與跳舞文化的努力。

此書第二部份則自第六章開始，重點放在舞廳文化與都會政治的討論。第六章“Ballrooms and Bombs: Cabarets, Underground Intrigue, and Occupation Politics, 1937-1941”（舞會和炸彈：舞廳、地下密謀、日本占領時期政治，1937-1941）主要考察了上海孤島期間 (1937-1941) 的舞廳文化。中日戰爭初

期，租界尚能維持中立，依舊弦歌不輟，吸引人潮，作者認為，此乃因舞廳提供了戰時人民逃避現實的娛樂空間之故。在本章中，作者還進一步討論上海舞場經營如何糾葛於繁複的政治網絡中，涉及了各國勢力、政治派系、幫派、資本家間的周旋協商。一九三〇年代晚期，舞廳更成為各種密謀詭計的源頭，爆炸案、暗殺案等暴力事件頻傳，舞廳成為抗日志士，乃至於黑道分子活躍之處。通過對親自走過這段歷史的舞廳從業人員訪談，本章揭露了上海複雜的政治網絡，以及各種勢力如何掩藏在上海歌舞昇平的娛樂生活背後，為本書尤其精彩的一章。

上海摩登之探討，多止於一九三七年戰爭開始、上海黃金時代宣告結束之時。本書的另一個貢獻便在於繼續考察了舞廳文化在中日戰爭期間與其後的發展。本書第七章“Regul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barets under Japanese and Nationalist Occupation 1942-1947”（調整與干預：日本與國府統治期間的舞廳，1942-1947），從都市治理的角度探討了日本和國民政府統治上海期間對舞廳的計畫性管理。一九四二年前後，日人在上海推行「保甲」制度，並成立「上海舞廳商業同業公會」等組織，後者在當局監控舞業大小事上發揮不小的作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重新掌管上海，並取回租界治理權，立即再次展開其重建大上海計畫，並沿用日本統治時期的若干制度，如以同業公會作為中介，針對其所認為相當破壞社會秩序及道德的舞廳進行管理，包括核發執照、統計舞女人數、蒐集舞客資料、收取娛樂稅及印花稅等。此時，由舞業從業人員及樂師所組成的工會也陸續成立，在政府干預舞業的同時，舞業人員也開始為自己的利益採取行動。

國民政府的禁舞行動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引爆了「舞潮案」——一個大規模的舞業人員暴力抗議行動。本書第八章“Resist to the E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Ban on Cabarets and the Dancers' Uprising of 1948”（抵抗到底！國民政府禁舞令與 1948 舞潮案）便專論此次事件的前因後果，並通過梳理此案，略為評價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最後統治階段。作者指出，在一九二〇年代，國民政府便試圖禁絕上海的舞廳文化；一九四五年後，在其將上海治理成中國現代化櫥窗的思考脈絡下，舞廳被視為罪惡的淵藪，道德墮落的象徵，更成為其首要整頓的目標。一九四八年一月，因協商破裂，當局下令陸續關閉舞廳，數千名舞業從業人員因生計受影響，聚集警局前抗爭，引發了暴力攻擊事件，致使數十人遭逮捕受審，當局則暫停關閉舞廳作結。舞潮案究竟是否出於

預謀？受誰指使、煽動？陸續引發一連串的討論；然舞潮案在國民政府統治末日之前夕爆發，作者認為，更揭露了此一時期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緊張關係。通過探討舞潮案之因果，作者在此章中爬梳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複雜的政治情況，並從側面刻畫國民政府在中國的末路圖景，足見其用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產黨政府在一九五〇年代成功地關閉上海的舞廳以及其他娛樂產業，在此書第九章“Building A New Society: The Demise of Caberet under the CCP. 1949-1954”（建立新社會：中國共產黨統治下舞廳的終日，1949-1954）中，作者主要論述共產黨如何吸取前人失敗的經驗，漸進地禁絕舞業。建立無產階級社會既是中共政府的施政理想，禁制舞廳自然成爲其建國後之目標；但與其斷然關閉，當局決定漸進處理，多管齊下：如善用公會協調輔導，加收賦稅，教育從業人員轉業等。此外，共黨政府大力宣傳舞廳是舊社會象徵，象徵布爾喬亞階級不良習尚，並有違其婦女解放理想，在新時代應加以禁止，亦頗收成效。一九五四年底，上海僅存的舞廳遂陸續轉型或關閉，繁華一時的上海舞廳遂落下終幕。

然地下舞廳或舞會並未從此在中國絕跡，直至大躍進期間，聯誼舞會仍時有所聞；改革開放後，跳舞文化也迅速在中國——尤其在上海——回魂新生。作者在本書後記中，還提及受惠於上海一九三〇年代跳舞文化的港臺流行文化。而時至今日，隨著商業發展及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和海外華人回到上海，上海夜生活的第二次革命在一九九〇年代後逐漸啓動。曾席卷上海，被戰爭、革命粗暴打斷的夜生活文化與現代夢幻世界得以還魂重生，迪士可、KTV 和更多的公共娛樂場所再次林立。上海，進入了更具攻擊性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

回首這百年變遷，上海舞廳雖一度成爲一個失落的世界，難以重返，然通過作者筆尖，縷縷歷史幽魂逐一顯影書扉，彷彿一日未曾散去。費嘉炯此書以開闊視野探討上海舞廳，以及其與都會治理、政治脈絡等之關係，較全面地呈現了二十世紀上海都會文化。此外，舞業在上個世紀中國的數十年興衰起伏，事實上與戰爭、革命等中國整體政治文化和現代化的綿長路途關係密切。此書研究上海都會文化，著重還原其時都會政治、近現代歷史脈絡，不僅幫助讀者理解現代上海摩登風華，更進一步地幫助我們認識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一個包含著斷絕與新生的時代，從而凸顯現代上海都會文化之研究價值。

此書較作者之博士論文更進一步，研究時間下限從一九三七年延長至一九五四年——舞廳文化在上海熄燈爲止，更全面地呈現上海夜生活與現代化

之路的全景。此書討論上海舞廳與都會政治，因涉及的研究年代長，研究範圍多元，探討的層面亦廣，觸及了中國現代性、印刷文化、國族建構、民國史、全球資本流動等議題，富有卓見；然也因本書包含了許多論題，而書籍篇幅有限，因此其論證也偶爾受限，沒有全面展開。

首先，在資料運用方面，本書參考徵引與舞業相關之資料，包括報刊、文學作品、歷史檔案、圖片等各種材料，十分翔實。其中，梳理《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西人報刊及西人紀錄、回憶文字，以呈現當時上海西人社群的舞會樣貌、西人回憶記述中的上海舞廳文化，頗有貢獻。論述上海黃金時期的舞廳文化，作者則多引用暢銷小報《晶報》以探討中國人對舞廳的看法與輿論，亦見用心。然而，同一時期在上海發行的中文報刊甚多，尤其如大報《申報》，或晚清各大報刊上與舞廳相關之討論，亦相當豐富，在凝望上海都會、舞女形象上，有其重要性¹⁴，相對之下，卻較少為作者關注。

另外，本書探討上海舞廳文化蓬勃發展的外來影響，分析深刻，然對於中國人接受舞廳文化的內在因素，以及舞廳文化與二十世紀初全球的文化流動等多方面促成跳舞文化在上海發展的原因，則較少討論。首先，清末以來，跳舞西俗，在中國社會原流傳不廣，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頌揚民主與科學，撼動舊傳統，鼓勵婚姻自由、女性解放，社會風氣一時大開；而隨西風日益東漸，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文化中介者通過譯介，聯繫起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增進彼此之理解，於是一般市民對於西方社會、文化形式的接受度大增，跳舞文化遂能在上海漸漸普及，此為其前因。

此一對於跳舞文化從陌生、質疑、接受的歷程，並非中國獨有，跳舞文化在歐洲數百年來的發展，亦是在與保守勢力的拉扯中，逐漸受到認可，並發展為日常交際活動。尤其作者在本書中曾論及，一戰後發源自美國的爵士文化風潮，是逐漸流行於世界各地，並吹向上海，帶動上海舞廳文化之發展，使上海逐漸發展成歌舞昇平之國際都會，乃至與巴黎齊名。也就是說，如同前人研究所指出的，中國舞廳的出現時間其實不十分晚於歐美¹⁵，舞廳文化在上海漸

¹⁴ 李楠、馬軍曾運用小報資料研究上海都會文化；後者尤專論舞廳。參見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一種綜合的文化、文學考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¹⁵ 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著，袁變銘、夏俊霞譯：《上海妓女：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的

興，實乃發生在一個全球文化流動 (cultural flow) 的脈絡下，在一個音樂、跳舞文化、電影產業在世界各地同步流行的網絡中，進行著音樂、舞蹈、金錢、種族各方面的交流，並在上海這個特殊的口岸體系中，展現其獨特面貌。除觸及了殖民現代性的議題外，中國現代的各種文化生產，也可說是與在此全球框架中發展的文化進程並行。由此，則中國現代性就不能被視作中國面對西方文明衝擊的回應，或是一「遲到的現代性」，而有其獨特樣貌。然在本書中，此一對上海舞廳文化與全球文化流動網絡的相關討論，並沒有全面開展，是較為可惜的一點。

舞廳文化如何通過文學作品與報刊、音樂、電影、時人回憶等媒介，在文學想像、報導、回憶的層面上，於上海通過各種論辯、商業運作等互動，造就各種意識形態以及都會文化想像辯證的空間，甚或形成一種「媒介迴路」(media loop)¹⁶，可論之處很多，本書雖論及此點，惜未深入。再具體來說，以舞女形象為例——如前行研究者與作者指出——時常被上海作家描寫為現代都會之象徵，著重突出其樣貌、舉止中西融合的特點；時而，則又會被報導、形塑成爲求生存，堅毅果敢的女性形象，象徵了堅忍的中國。而在當時左翼陣營的作品中，通過類似的生產機制和媒介（報刊、電影等），舞女則被呈現為備受壓榨、掙扎於社會邊緣的待解放女性形象，如同上海（中國）的象徵。上海舞場的摩登繁華，固然是上述左翼作者欲批判的對象，然此摩登繁華也被操作以闡揚其理念，足見此議題之呈現涉及了各種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樣貌複雜，值得細緻處理。

再說到舞女成爲上海現代報刊關注的焦點，識者或能指出，此與五四以來中國文化場域現代性建構與新女性論述的連結有關，如周蕾、周慧玲的研究所顯示，對舞女的集體消費，源自於一種現代的「偷窺主義」¹⁷，作者亦曾論及。然報章媒體外，在當時的其他文學作品、電影和流行歌曲中，亦有許多關於舞場或舞女的描述，從各種方向共同建構出舞女形象。不過，舞女既是報刊、文

賣淫與性》(*Belles de Shanghai: Prostitution et sexualité en Chine aux XIX^e-XX^e siècles*)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13。

¹⁶ Andrew F. Jones,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9.

¹⁷ Ray Cho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171.

學作品描述的對象，但她同時也是一個體，身處於社會與歷史結構中；她既受限於社會意識形態所虛構出的性別角色，實際上也存在於這類性別角色之外。作者在本書中通過文學作品中的舞女，以及舞女生平考察兩造並陳，呈現出以上兩種論述舞女議題的角度；然如能從性別角度出發，對舞女自敘生平或回憶錄加以梳理¹⁸，或對新感覺派作家刻畫舞女的小說（如施蛰存的〈薄暮的舞女〉）細讀分析，或更能在對照互見中見前人所未發。

作者在書中亦指出，爵士文化的流行，提供中西男女老少各色人歡聚的空間，造成打破藩籬的效果。在上海，此一爵士年代帶動的舞廳文化，更有助於消除華洋雜處的海「半殖民地」(semi-colony) 社會中不同階層間的隔閡，迎來了上海更具國際都會主義 (cosmopolitanism) 氛圍的黃金時代。作者還進一步指出，舞廳文化反映了中國社會漸受西俗影響，兩性關係以及社交模式逐漸開放，展現了流動的兩性關係。然而通過以上觀點，我們可更進一步去思索的是，這些看似區隔或對立的疆界，除了如本書所指出的，是租界與華界的分治與隔閡，男與女的性別差異，更可能是現代文明與傳統中國的歧途，也可能是都會與鄉野生活模式的區別。此外，(半) 殖民體制 / 性別 / 階級隔閡究竟是否被跨越了？如何跨越？似乎還需要周延論證。

作者在此書中挪用班雅明談拱廊街的觀點，以對比上海舞廳，以為上海舞廳是「現代性的夢幻世界」(p. 4)；進一步來說，即作者認為上海舞廳如同巴黎拱廊街，形塑出一個以物 / 符號為主的消費空間，甚至創造了一個堆疊物 / 符號的夢幻世界，製造豐富錯覺——漫遊者為商品著迷，而上海市民則對舞廳提供的明亮現代西方入迷——此對照堪稱有效。若沿著這個思路再進一步思考，作者在本書第三章中指出，當時上海舞廳建築、裝潢十分富異國情調，亦即具有一獨特的他方感 (elsewhereness)、形塑了一個異國化的氛圍，彷彿在召喚著另一個時空。然在這市民消費異國感的經驗中，視覺媒介其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當時逐漸在上海興起的好萊塢電影。電影通過視覺呈現，提供觀眾一個嶄新體驗，將觀眾從此時此地帶到另一個地方，挑戰其對真實的想像。具體來說，當時在上海上映的以舞廳或舞女為主角的好萊塢電影如《跳舞熱》(*The Dancing Fall*)、《巴黎一舞女》(*The Dancer of Paris*) 等，或若干中國

¹⁸ 比如曾活躍舞場的北平李麗，其回憶錄已於前幾年出版。請參見李麗：《誤我風月三十年》（臺北：時英出版社，2010年）。

人拍攝的電影中，都曾出現過舞場或跳舞鏡頭，使觀眾對於跳舞文化有更直觀的認識。同為技術媒介的廣播、留聲機，乃至於西方舞者的表演，與此一舞廳裝潢、報刊圖像與更龐大的媒體文化脈絡連結而成的媒介景觀 (mediascape)¹⁹ 對上海舞廳文化的影響，也值得在文中進一步爬梳。

總的來說，此書論上海現代跳舞文化與都會政治，從物質文化的梳理、報刊文字、回憶訪談、歷史檔案的蒐集，以及政治文化、歷史背景的考證著手，考察從二十世紀初到中共建國後，上海舞廳與中國現代性樣貌，勾勒出豐富多元的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化圖景。尤難能可貴者，在於作者的分析能將上海風華與當時的政治文化脈絡結合，呈現上海數十年都會文化發展歷程之全貌。作為讀者，亦是上海都會文化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同好，閱讀此書是美好的歷程。以上看法，與其說是評述，不如說是心得，僅提出與作者切磋、交流。誠如上文所述，上海現代都會文化樣貌繁複多元，而上海研究花園中若能有如當時都會文化一般精彩豐富的研究成果，實為學界與讀者之幸；而其中，費嘉炯此本專著，無疑是近來相當值得關注的一本。

¹⁹ 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2 (Spring 1990): 1-24.